

·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

# 摩尼教兴衰因缘及其罗山草庵遗迹探究

刘青泉

摩尼教在公元 3 世纪由南巴比伦人摩尼创立,后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公元 6 7 世纪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摩尼教的教义在古代曾经对下层人民起到了鼓舞作用,但因遭到上层统治者的诋毁,在世界上已经湮没。在我国尚存的福建罗山草庵摩尼教遗迹,引起了世界宗教史研究者的浓烈兴趣。笔者多次造访罗山草庵,研讨有关资料,认为其所存文物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作者刘青泉,1939年生,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

摩尼(Mani)是古波斯国南巴比伦(今属伊拉克)的一名贵族子弟。他生于公元 216 年 4 月 14 日,在 24 岁时创立一种宗教,人们称之为“摩尼教”。摩尼先生在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国都泰锡封宣传他的宗教主张,后又到印度半岛西北部(据传说他还到过中国西部地区)、伊朗等地传教,最后被上层统治者监禁,于公元 277 年 2 月 26 日逝世。

据说摩尼亲自著作过 7 部摩尼教正典。其教义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二宗三际论”上。这个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两个王国,一个叫光明(善),另一个叫黑暗(恶),这就是所谓“二宗”。摩尼教认为天地产生之前,光明与黑暗两者对峙,互不相干,这种状态叫做“初际”。第二阶段是黑暗王国侵入光明王国,后者受到很大损害,经大明尊召唤明伎起来战斗,终于把暗魔打败,产生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这个阶段叫“中际”。第三阶段是“后际”,因世界毁灭,又恢复成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王国。

摩尼教主张,善(光明)必然要战胜恶(黑暗)。在古代,这样明快的理念和响亮的口号鼓舞了许多受压迫的下层群众,通过斗争赢得光明的前途。所以,摩尼教在古代曾经拥有许多信众,成为主要宗教之一。古代上层统治者对此感到恐惧,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下令取缔摩尼教,将创教人摩尼处以死刑。

摩尼逝世后,摩尼教还在传播。此教提出“不拜偶像”、“不行邪道”等十戒,在当时具有比其他宗教更为进步的意义。古代摩尼教曾经发展成一种世界性宗教,传播到埃及、意大利、西班牙、北非、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印度、中国等地,对当地社

会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 二

根据在中亚地区发现的记述摩尼教的残卷所载,公元675年摩尼教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扩散到中国内地。唐代延载元年(694),波斯帝国的摩尼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据说当时唐代女皇武则天召见过波斯拂多诞(高级僧侣的称号)乌没斯,对摩尼教的教义表示赞赏,礼请乌没斯留下来讲经<sup>①</sup>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摩尼教拂多诞在中国传教时,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书由古叙利亚文本译成汉语文本。此书曾在敦煌出土文物中找到,是研究摩尼教在中土传播过程的重要资料。当时唐玄宗准许摩尼教自由传教,因此《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译本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在民间流播较广。

公元8世纪60年代,摩尼教在外蒙地区(当时称回鹘)发展相当快,信众甚多,登里可汗把摩尼教立为国教。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皇帝向登里可汗求援。公元762年,登里可汗派兵杀入洛阳等地,他要求唐朝在长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在荆州、洪州、扬州、越州、河南府和太原等地也建立摩尼教寺庙。这样一来,摩尼教成为仅次于佛教与道教之后的一大宗教派别。唐武宗时,发起“灭佛”,同时也下令敕禁摩尼教。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统治者也都下过限制摩尼教活动的禁令,遂使摩尼教归于湮灭。

但是,摩尼教自唐代至明代在中国民间还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在思想上与其发生共鸣,例如,宋代著名理学宗师朱熹曾经到福建泉州清源山晋谒摩尼教呼禄法师之墓。呼禄法师在唐代会昌年间由中原地区到福建传播摩尼教,后死于福建,葬于泉州。据明代著名学者何乔远《闽书》所称:“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sup>②</sup>摩尼教呼禄法师在福建传教时足迹遍福州、福清、泉州等地,影响较深远。他还作诗表明对摩尼教的信仰和对呼禄法师的崇拜。自五代起,多次农民起义利用摩尼教(后易名为明教)这种宗教形式组织群众,采用它的教义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后梁时代(920),陈州毋乙和董乙等人利用摩尼教起义,号召当地农民起来造反,曾经聚众千人,声威震撼陈州、颍州、蔡州等地。后唐和后晋时也有农民起义利用摩尼教聚众反对封建统治者。北宋宣和三年(1120)方腊等人在睦州利用明教(其前身即摩尼教)发动农民起义,曾经攻占7州48县,影响甚大。南宋建炎四年(1130),信州王念经等人大规模宣传摩尼教教义,串联农民数万人,组成起义军,攻占贵溪、弋阳等地,与封建统治者进行激烈争斗。事隔不久,严州和东阳等地分别爆发以摩尼教为旗号的农民起义。元代中叶又有农民利用摩尼教与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由此可见,摩尼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sup>①</sup>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9页。

<sup>②</sup> (明)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 三

南宋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的摩尼教活动相当活跃(各地名称不一,或称明教,或称牟尼,等等)。由于宋王室南渡后内忧外患相当严重,政权十分脆弱,封建统治者更加害怕民众崇拜摩尼教,所以对摩尼教千方百计加以诋毁,甚至以邪门左道论处,下令不准传教。因此,一些摩尼教传教士由浙江继续往南方转移,其中多位法师来到福建的福州和泉州等地传教。他们把在福建等地所传的摩尼教改称明教。宋元时期福建的明教徒活动较为频繁,影响也相当广泛,他们大量刊刻摩尼教经像,在民间广为散发。

1979年在福建省晋江县罗山镇苏内村的摩尼教遗址——草庵的庵前曾经出土了刻有“明教会”字样的宋代黑釉瓷碗等一批珍贵文物,证明罗山地区在南宋时代就是明教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罗山草庵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3),元代至元五年(1339),摩尼教徒还在庵内的石崖上镌凿一个大圆龕,雕刻一尊摩尼光佛坐像。此浮雕坐像高1.52米,宽0.83米,脸庞丰润,明眸隆鼻,朱唇柳眉,目光专注,双手相叠于膝上,背靠石雕大圆轮,镌刻着波状由内向外辐射的线条,象征着摩尼佛光芒四射,给人间带来无限光明。由于该石崖的巨石天然具有三种颜色(红色、墨绿色和浅绿色),因此石刻的佛像和光轮具有多种色彩,映射出美妙的毫光。这尊摩崖石刻的摩尼坐像是世界上保留至今唯一的摩尼雕像,199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草庵右侧尚有一座岩崖,巨石上镌刻着18个大字:“劝念 清静光明 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 摩尼光佛”。刻有相同内容的摩尼教石刻教碑,1988年在福建莆田涵江、1992年在莆田北高乡后积村等均有考古发现。

罗山草庵的摩尼光佛石雕坐像虽经660年的沧桑岁月,但至今保存完好,近些年来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不少人不辞路遥辛苦前来考察。1987年在比利时举行的世界摩尼教学术研讨会就采用罗山草庵的摩尼光佛坐像的图案制作会徽,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它是现存的独一无二的摩尼造像,并认为这是近年来世界摩尼教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1991年2月和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也前后两次到罗山草庵考察,他们认为罗山草庵的“重新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的最大成就”。

## 四

考察罗山草庵摩尼教遗迹可以明了:宋、元、明时期摩尼教在罗山地区曾经相当活跃原因之一是摩尼教“二宗三际论”的教义当时十分符合下层人民的心理愿望。南宋及元代,中国社会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相当尖锐。多数下层人民生活困苦,他们企望“救世主”能够把他们救出苦海。“二宗三际论”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种慰藉,受苦受难的民众由此获得一线希望。南宋时代摩尼教传教士纷纷来到福建泉州、罗山一带传教,他们的宣传活

动甚得民心。从1979年在罗山草庵庵前出土的宋代明教会遗留文物可知,摩尼教(明教)在该地区有广泛的组织。这里教会会员崇尚白的服色,教会提倡素食和戒酒,号召穷苦人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广大农民对摩尼教(明教)教义引起共鸣,认为“二宗三际论”表达的深刻哲理“无上至真”。<sup>①</sup>

元代初年,封建统治者放松了对摩尼教(明教)的管制,允许其传教。此时,福建的摩尼教(明教)抓住机遇获得较大的发展。及至元代中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又趋尖锐,摩尼教(明教)的活动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因此元王朝又宣布此教为非法,禁止其传教和聚众活动。朱元璋借红巾军的力量取得帝位。他曾经接受明教教义,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但当上皇帝以后却下令取缔明教,对“煽惑民众的为首者”宣称要处以绞刑,而“从者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但是,罗山地区因地处僻远,有华表山为屏障,摩尼教(明教)在民间仍然久传不辍。由于福建沿海人民在古代多次渡海移居台岛,在此过程中也把摩尼教(明教)传播至台湾。正如罗竹风先生主编的《宗教通史简编》所指出:“在中国,回鹘灭亡后,摩尼教在843年被禁止,教徒受到迫害,但一直到14世纪以后该教仍在活动,尤其是在福建和台湾一带。”<sup>②</sup>

罗山地区的摩尼教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与佛教活动及“书院”讲学有所关联。这种因缘有利于保存摩尼教的力量和保护摩尼教的历史文物。佛门高僧瑞意、广空和弘一法师都曾经在草庵住持。罗山草庵大门口石柱上有广空法师题刻的对联:“皆得妙法究竟清静,广度一切犹如桥梁。”弘一法师也在草庵殿堂内题刻楹联。在明代嘉靖年间,罗山草庵左侧还有个“龙泉书院”。执教者洪天馨(号薇峰,又称梭陵通衢道人)隐居于草庵,他所教的18名书生皆中了进士。其中王慎中、陈皋翔等人声望尤为显著。王慎中是明代中叶著名文学家,在当时文坛上是“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陈皋翔中进士后接连升官,位及左丞相。由于上述种种因缘,罗山草庵摩尼光佛坐像及其他珍贵文物得以保存和流传,成为今天世界宗教史研究者一份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责任编辑 王子华)

① 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见《燕京学报》1928年第3期第383页。

② 罗竹风主编:《宗教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4页。